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三卷·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61235

I109

111

V3-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三卷·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8346

I109

111

V3-2



北航

C174834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史. 第3卷/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陈淑贤等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2(2014.7 重印)

ISBN 978-7-5321-5159-2

I. ①世… II. ①俄…②陈…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076 号

责任编辑: 胡远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世界文学史·第三卷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陈淑贤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5.75 插页 8 字数 1,357,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59-2/I·4070 定价: 255.0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ТРЕТИЙ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ТОМА

Н. И. БАЛАШО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П. А. ГРИНЦЕР, Х. Г. КОРОГЛЫ,
Д. С. ЛИХАЧЕВ, Е. М.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А. Д. МИХАЙЛОВ, В. Б. НИКИТИНА,
Б. Л. РИФТ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第三编 达尔马提亚、西部斯拉夫和 匈牙利文学

• 414

本编序言

西部斯拉夫人、南部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尽管遭受了蒙古—鞑靼汗国的入侵、土耳其人的进犯,经历了包括粉碎胡斯派、反宗教改革反动势力及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震荡,他们的文学和科学的人文主义复兴,尤其是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仍然日益强有力地发展着。在中欧和南欧的拉丁语诗人采尔文和马鲁利奇(达尔马提亚)、洛布科维茨(捷克)和潘诺尼乌斯(匈牙利)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波兰的科哈诺夫斯基和匈牙利的巴拉什的创作成就是把文艺复兴诗歌同民间歌曲的自然要素融合在一起,就其民族意义和艺术技巧来说可以当之无愧地与“七星诗社”的法国诗人们相媲美。别尔斯基和斯特雷伊科夫斯基的编年史不仅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获得好评;斯拉夫人文主义者的大量成果还被西方的史料编纂学所吸收。

当然,这是高峰。中欧和南欧的所有人文主义者在十六世纪已经开始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关于“伊利里亚和萨尔马特的野蛮”、“潘诺尼亚的残忍”的传说,然而,土耳其的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日耳曼化的悲剧使欧洲这一地区各民族遭到不幸,中断或者阻碍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为这一地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全面繁荣造成了困难。

达尔马提亚、匈牙利、捷克、波兰受西欧拉丁文化的影响,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一特点无疑有别于拜占庭文化传统、格拉果尔和基里尔文学占优势的地区(虽然在达尔马提亚各种思潮和影响相互碰撞和混杂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诚然,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与中世纪的区别之一)开始形成某种巴尔干的(部分地区是中欧和东南欧的)文化和文学统一的条件,这种统一以独特的过渡性和处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中间状态”为标志。尽管如此,上述每一个国家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仍是一直相当正

规、经常而广泛。西欧文艺复兴的著名代表人物在这里长时间地滞留,有时还定居、工作和从事教学(在匈牙利的有维尔吉里奥、邦菲尼、加列奥托·马尔齐奥;在波兰的有卡利马科斯和采尔蒂斯)。这些国家的贵族青年和平民青年也经常在西欧的大学里(十五世纪多在意大利,十六世纪多在德国)了解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

鉴于文艺复兴时期活跃起来的与西方的传统的联系,加之对东方的了解,这里的文学和艺术也不同程度地摆脱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教条,文学开始获得世俗的、尘世的、富有创造力的和具有民族色彩的内容,从讽喻和醒世文学转向鲜明地、艺术个性化地反映现实。

这些国家文艺复兴的过程具有全欧洲及整个区域的文化和文学意义。捷克的胡斯运动成了未来新教的原型并且对欧洲后来的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地心说的推翻与波兰相联系,这一学说曾经打破了中世纪关于世界的神学概念。在论及意大利、德国中介作用的重大意义时,不当忽略中欧、东南欧和南欧以及西部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独立性。反对神学繁琐哲学的思想遍及各地,这无疑都是根据本身需要而产生的,它促进了与文艺复兴的发达文化频繁接触,促进了双边联系的确立。

此外,反抗征服者与压迫者(时而反抗威尼斯、时而反抗奥斯曼、时而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这是一种斗争的需要,它使达尔马提亚、匈牙利、捷克、波兰相互联合并且同整个南部斯拉夫和巴尔干区域联合起来,然而这种需要对于西欧来说远非特别尖锐和迫切。除了国家朝代关系(存在匈牙利—克罗地亚王国和匈牙利—克罗地亚—捷克王国;选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为波兰国王),除了本身生活条件(西里西亚、特兰西瓦尼亚语言的密切联系),这种斗争需要也使文化和各民族接近起来,加强了人文主义者对命运一致性的认识,加强了不仅应归属于西方世界的认识,而且从广义来说,也应归属东欧世界的认识。十六世纪在南欧广为流传的有关斯拉夫人(“伊利里亚人”与“俄罗斯人”)同源的传说是完全可能的,此外,面对土耳其入侵的现实威胁,寻求哪怕是“理想的”抗击土耳其的联合力量,也导致支持这种传说的流传。

抗击侵略者的任务也提出了大量的社会和文学问题,激起包括对民间创作的初步兴趣。欧洲这一地区的作家与民间创作的联系通常要比西欧作家广泛得多。达尔马提亚作家马鲁利奇和德尔日奇运用了民间形象和比喻。波兰作家雷伊和希莫诺维奇的作品中、捷克戏剧家达奇茨基的歌曲和喜剧中,都有着人民生活、人民思维和语言的要素。

科哈诺夫斯基作品通过民间诗歌的节律折射出全欧韵律体系。这些国

家的文艺复兴文学在艺术色调方面非常大众化。

对周围生活、民间习俗和语言、对民间口头创作传统的重视,创造了现实主义的前提条件。在将古希腊罗马的情节、意大利拉丁语作品样式运用到本国现实中,在赋予主人公以人们熟悉的具有独特表现力和社会生活特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自发的现实主义倾向。德尔日奇依据普劳图斯和锡耶纳人传统所创作的喜剧人物,多是城市的贵族商人和拉古萨的平民。波兰贵族社会的冲突通过鲜明而具体的事实生动地体现出来,这些冲突使雷伊产生创作冲动。科哈诺夫斯基的诗歌善于在个人的抒情性具体个例中表现普遍和崇高,这一点为他赢得很高声誉。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蓬勃开展的宗教改革及其影响和反应,推动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人文主义的解放运动。解放运动强烈地激化了反教会情绪,促进了自由信教的发展(十六世纪中叶在波兰承认各宗教信仰平等),巩固了民族语言在思想文化斗争中的地位,加强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内容。首先,作为胡斯运动的故乡,宗教改革是捷克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决定了捷克文学的许多特点。十五至十六世纪捷克人文主义的一些难以分割的特征,如过分严肃的道德色彩,连同公民—讽刺倾向和充满激情—哲理倾向(洛布科维茨),离开胡斯运动的内容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而其他的一些社会—历史情况,诸如西方和东方之间政治经济中介地位的利益、天主教势力与正教—波米耳势力的对立、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拜占庭—地中海文化传统的对立,都给达尔马提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打上了伊壁鸠鲁—享乐至上主义,有时甚至是实利主义的烙印。

匈牙利和波兰文艺复兴的巨大成就在于运用本族语创造了文艺复兴诗歌(巴拉什、科哈诺夫斯基),社会、政治斗争(在匈牙利则是反对土耳其的解放斗争)的全民族的广泛规模在这一方面发挥了作用。由于具有较为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国家独立),由于有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由于与德国、立陶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文化有广泛的和频繁的交流,波兰的文艺复兴时代比匈牙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更为丰富而且分支众多。在这里政论作品迅速繁荣;史学、法学、自然哲学取得了显著成果。

文艺复兴时期的达尔马提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文学,是相同和不同的紧密结合,是变化和稳定的紧密结合。在相互交替和相互作用之中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文学复杂的历史道路,而这种复杂道路又使这些国家文学之间,包括与南欧和巴尔干(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摩尔达维亚)的文化和文学之间更加接近。后来,在反对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这些联系益发得到了巩固。

第一章 达尔马提亚文学

416 ·

1. 达尔马提亚和拉古萨^①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潮

达尔马提亚——亚得里亚海巴尔干半岛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连同一些岛屿——的历史命运相当复杂。斯拉夫人对达尔马提亚最大的一次入侵发生在615年,这次入侵转变成占领。沿海各城市的居民一部分逃亡到岛屿上,也有人去了意大利。后来,在拜占庭的帮助下某些城市得以重建。例如重新恢复了雅德拉(扎达尔—萨拉)、特拉古里恩(特罗吉尔—特劳)。埃庇丹努城流放的犯人在被毁坏的城市以北十公里的地方修筑起一座设防的居民点,叫作哥拉萨(拉古萨)。在狄奥克利提安宫殿城堡完好无损的围墙内阿斯帕拉车(斯普利特)平地而起。拜占庭对达尔马提亚的统治并不稳固,拜占庭的统治者们经常不得不把控制权让给克罗地亚人和威尼斯人,1186年伊萨克·安格尔皇帝在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的压力下放弃了对达尔马提亚的领有权。在达尔马提亚腹地(拉古萨以北)八至九世纪时建立了第一个克罗地亚国。克罗地亚的王公们由西方的传教士施洗礼,而在人民群众当中基里尔和梅福季(九世纪末至十世纪)的弟子们在传教,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采用斯拉夫的祈祷仪式和格拉果尔文字。用这种文字创作了克罗地亚人民的第一批文学文献。神甫们运用“格拉果尔”文字把未载入基础祈祷书中的西方宗教著作由拉丁语翻译成教会斯拉夫语。统一的标准语促进了伪经、“启示录”、“神谕集”、圣徒行传这些富有故事情节的作品从东方传入克罗地亚。这类文学对民间史诗的某些主题也产生了影响。在达尔马提亚南部、拉古萨和科托尔,斯拉夫作品文本不用格拉果尔文字记载,而是用塞尔维亚的基里尔文字写成的。在达尔马提亚的城市,从博埃齐到伯尔纳(明谷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如同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用拉丁语创作轻重音格律诗。

九世纪起威尼斯一直力图使达尔马提亚臣服于自己。十四世纪威尼斯人不得不将之让于安茹王朝的匈牙利国王。但是,在十五世纪初,威尼斯

① 拉古萨,原文写作“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为史书习称,“杜布罗夫尼克”之名是1908年由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改定的,并且此名仅用来称呼该城,而以该城为中心的历史上著名的“海洋共和国”一直称“拉古萨共和国”。本书作者更多是出于斯拉夫文化的原因而在文中使用“杜布罗夫尼克”及“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这一称谓,中文沿用易引起史实混乱及误解,故本书中均改为“拉古萨”、“拉古萨共和国”。——编注

人在这里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并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时期。威尼斯人时而帮助城市繁荣发展,抵御土耳其的入侵;时而破坏亚得里亚海地区的经济。此外,他们又是意大利文化的传播者,意大利文化在十五至十六世纪时几乎成了全欧洲的文化。在威尼斯,来自佛罗伦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的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各种流派交织并存。同时,达尔马提亚的城市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之间的联系也从未中断,这种联系在匈牙利的安茹王朝时期更加巩固。当时,路易一世(拉约什大帝,其母是波兰人)正从卡西米尔手中继承波兰王位。可以推断达尔马提亚人关于所有斯拉夫各族人民必须统一的思想正是在安茹王朝时代产生的。

十四世纪达尔马提亚的城市已经完全具有了斯拉夫性质。拜占庭时代执政官和统帅出身的贵族们——罗马化了的希腊人和伊利里亚人逐渐掌握了斯拉夫语。斯拉夫领袖和首领的后裔被接纳进入贵族行列。人文主义者艾利·采尔文(茨利耶维奇)向拉古萨的创始者——“罗马居民们”、“全权公民的后裔们”大声疾呼是徒劳的,因为拉古萨的贵族们认为自己是斯拉夫人,而希什科·门契蒂奇(罗马门采家族出身)为了用斯拉夫语创作诗歌而背弃了拉丁语的诗神。

土耳其人于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之后,从1468年起开始进犯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领土,占领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城市长期处于恐怖之中,村民纷纷躲避到城堡大墙后面,有些人逃上海岛,有些人移居意大利。同时也有人从腹地向达尔马提亚逃亡,这主要是一些塞尔维亚人,他们带来了英雄史诗(这一期间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的民间创作中,显然是抒情歌曲和仪式中进行的歌曲居于主要地位)。塞尔维亚的乌斯科克(屯垦者)和起义人员是以作为土耳其不可调和的大敌而著称的。

拉古萨由于向苏丹交纳大量贡赋并且名义上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才得以避免土耳其人侵占国土。拉古萨甚至因为在巴尔干确立了新的秩序而富裕了起来。他们和土耳其人成功地进行贸易,同时通过海路与西方发展实业交往。他们在赎买俘虏中进行调停,为从土耳其人那里死里逃生的拜占庭、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著名人士提供避难场所。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拉丁语诗人之一米凯尔·马卢尔·塔尔哈尼奥特(卒于1500年)的双亲移居到圣弗拉赫的共和国。塔尔哈尼奥特的青少年时代在拉古萨度过,他并为居住过的这座城市创作了庄严的颂诗。颂诗中他把斯拉夫共和国的风清弊绝、治国有方与那不勒斯王国的无政府状态两相对立起来,后者的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有如埃特纳火山爆发一般。

迎着十五世纪的风暴和苦难,达尔马提亚的人文主义的形成早于欧洲大多数国家。达尔马提亚人文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

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它继承了本地的拉丁—伊利里亚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遗产。达尔马提亚的根基在于古典的古代文化,在扎达尔、斯普利特、特罗吉尔,到处都能够见到希腊罗马的古代陵墓、雕像、古建筑废墟的遗迹。

使用格拉果尔文字的祈祷仪式、教会斯拉夫语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对达尔马提亚城市的文艺复兴诗歌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在达尔马提亚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拉古萨和科托尔被东正教的乡村包围,而从十六世纪起又被伊斯兰教徒的堡垒和居民点包围。拉古萨人同阿拉伯世界的海上贸易往来在那时也丝毫不比同那不勒斯、加泰罗尼亚和拜占庭的联系逊色多少。

各方面影响的混杂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并存,在一些阅读过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著作的思想家们身上则导致了怀疑主义观点。在达尔马提亚十四至十六世纪文学中不仅有意大利的形象,也不仅有不同程度接受了希腊—拉丁语文学遗产,而且还存有着那一时代的地中海文化中多种多样的成分。达尔马提亚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罗马的斯拉夫人”——伊利里亚人的后裔,据传说远在巴比伦塔倒塌,人类在地面上逃散的时候,伊利里亚人就已居住在亚得里亚海的东岸了。正如传说中所写的那样,三兄弟从伊利里亚来到北方,他们是捷赫、列赫和麦赫(或者罗斯),他们繁衍出西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达尔马提亚人文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圣哲罗姆——达尔马提亚的庇护者,不是希腊人,而是斯拉夫人。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南部斯拉夫作家的概念中伊利里亚是人员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统一的摇篮。这一说法为亚盖洛王朝时期的捷克和波兰很多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所接受。

2. 人文主义的拉丁语诗歌

当1435年著名的希腊—拉丁古文献收藏家奇里亚科·德·皮齐科利从安科纳来到达尔马提亚的时候,他在扎达尔和特罗吉尔发现了两个达尔马提亚人乔治·班尼亚和彼得·奇皮科已经收集到的一套罗马时代的札记和极为罕见的拉丁语手写稿。奇皮科的儿子科里奥兰是威尼斯船队单排桨战船的船长,抗击土耳其人海战回忆录的作者。回忆录于1477年出版,后来翻译成意大利语并且直到十八世纪末时多次再版。回忆录用人文主义拉丁语写成,其风格近似恺撒。彼得·奇皮科的孙子阿里维泽(路易,卒于1504年)是当时著名拉丁语诗人,其风格有些矫揉造作。由此可见,奇皮科一家三代人在十五世纪期间代表着人文主义的文学和科学。十五世纪八十年代时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希贝尼克的尤里·希日戈里奇证明他的故乡城市

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一批同乡因精通神学、物理学、诗学、演说术、教会法和皇家法（民法）而驰名于世，他们的崇高精神甚至在意大利也常常令人惊叹。”

该世纪中叶，在彼得拉克派意大利诗人费利拉的雷焦（拉古萨共和国国务秘书）的周围集聚了一些贵族，他们写过一些诗，但是没有流传下来。拉古萨人德日沃·古契蒂奇（约翰·戈齐，1451—1502年）是运用本族语写作的希什科·门契蒂奇和德尔日奇等首批先驱者中的一个。他把自己的拉丁语诗寄到意大利征求意见。波利齐亚诺在信中对戈齐大加赞扬，不乏溢美之词。遗憾的是这位拉古萨人文主义者只有一首拉丁语讽刺短诗留传后世。在扎达尔卢克莱修的门徒马法奥·瓦拉雷佐大主教的住宅为拉丁语诗歌爱好者们开放。扎达尔的人文主义者在这里讨论波吉奥·布拉乔利尼的著作和巴诺尔米塔的诗。

希贝尼克的伊凡·巴尔布拉（1472—约1526年）在意大利以各种拉丁化了的姓氏赢得了“桂冠诗人”的荣誉——约翰·巴尔布拉·蓬皮利，波利卡普·塞维里坦。巴尔布拉是庞波尼·列特和马尔康托尼·萨贝利克的学生，他撰写了语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专著，创作了有关创世纪的史诗。

1457年拉古萨大富商和那不勒斯外交家本尼迪克特·科特鲁尔耶维奇（贝内德托·科特鲁戈里，十五世纪）撰写了《论商业和完美的商人》一书（1573年在威尼斯出版），不仅表现了作者商务和政治方面的兴趣，而且反映了他的人文主义素养。看来古典主义的传统在科特鲁尔耶维奇家族是世代相传的，其父亲、祖父都在那不勒斯王国有许多重要的关系，他们曾担任过拉古萨共和国的“发言人”（即大使）。科特鲁尔耶维奇教女儿们学习拉丁语，她们能够背诵维吉尔的诗歌。

• 418

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不无自豪地说，是他在欧洲第一个确立了商业的“科学和艺术”的实质所在。科特鲁尔耶维奇在他的专著中坚持认为必须对商人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商人是作为外交家被派遣去会见王公贵族、先生、太太们的，但是如果受过文学教养，不熟谙演说术，那么他们就无异于“追逐里拉的蠢驴”。科特鲁尔耶维奇主张必须有真才实学，他举出了古代圣贤之士（第欧根尼和阿夫尔·赫利）作为证明。当然，他也指出，作为商人在自己的事业中首先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他必须善于识别商品质量，熟谙地理和航海知识。但是也不妨再学习一些哲学，以及有助于辨别真伪、驳斥不正确的论据和三段论的逻辑学。《论完美的商人》这部专著的作者是城市商人阶层（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封建的）新精神的杰出代表。不仅在达尔马提亚文化中，而且在欧洲资本主义整个历史中他的著作都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文献。

十五世纪末达尔马提亚的人文主义文化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曾担任过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秘书的人文主义者雅各布·班尼齐(班尼切维奇, 1466—1534年)当时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班尼齐与对他极为敬重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通信,他无疑是处于那一时代古典教育水平之上。曾受到班尼齐庇护的阿尔布莱希特·丢勒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这位达尔马提亚人文主义者的名字在亨利八世和不列颠外交代表的往来信函中经常出现。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没有自己印刷业的达尔马提亚却向意大利提供了两名最优秀的印刷出版家:安德里·帕尔塔希奇(安德烈·德·卡罗或卡拉连基斯)和多布里奇·多布里切维奇(博尼努斯·德·博尼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感兴趣的图书编目专家们都非常熟悉这两个名字。安德里·帕尔塔希奇的活动时间是1476年至1492年,他在威尼斯大约出版了三十部书,主要是拉丁语古典作家(西塞罗、普罗佩提乌斯、泰伦斯)的作品。多布里奇·多布里切维奇(约1450—1528年)在维罗纳、布雷西亚、威尼斯和里昂工作。从1481年起他出版了四十三部作品,其中包括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和卡图卢斯的诗歌,但丁的《神曲》(1487)以及人文主义者弗拉维奥·比翁多描写罗马的作品。

达尔马提亚是一批天禀聪颖的人文主义诗人的故乡,拉古萨的伊里亚·茨利耶维奇(艾利·拉姆普利季·采尔文,1469—1520年)和斯普利特的马尔科·马鲁利奇(马尔科·马鲁利亚)两位诗人是其中的佼佼者。艾利·采尔文在拉古萨接受到的人文主义教育,后来在费拉拉充满古典语言气氛的罗马科学院的创始人庞波尼·列特(卒于1497年)身边学习。1484年4月21日艾利作为当时杰出的拉丁语抒情诗人被授予卡皮托利丘桂冠。他参加过由庞波尼·列特组织的在里阿利奥红衣主教宫殿里举行的普劳图斯喜剧的演出。这位拉古萨诗人早期的抒情诗中有与蓬塔诺创作中近似的爱情主题。艾利喜爱的罗马女主人公弗拉维亚形象与勒斯比亚、威丽娅或肯提亚相似。但是,这位达尔马提亚诗人的诗既不是拉丁语哀诗的老调重弹,也不是那不勒斯派拉丁语抒情诗的仿制品。在意大利人们把他忘记了,尽管他与罗马的以及那不勒斯的朋友(其中包括诗人蓬塔诺)保持书信往来。不幸和贫困一直折磨着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成了鳏夫,当上了神甫,他为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语调悲戚:

艾利躲入狭窄的藏身之处
默默无言,
也好,终于轮到了我,
恶意的忌妒,快住嘴吧!

在拉古萨他写了一些精湛的诗歌,其中包括献给拉古萨的颂诗,诗中坚定不移地认为拉古萨人起源于罗马人。艾利不喜欢“伊利里亚语”(即斯拉夫语),他认为这种语言破坏了拉丁语的和谐,但是,在达尔马提亚人文主义者当中却是他第一个描述了从亚得里亚海岸到波罗的海岸,从里海到俄罗斯国家边界这一幅员辽阔的斯拉夫王国。在曾经到过波兰和乌克兰的列特的作品影响下,艾利对斯拉夫一些国家的兴趣更加浓厚。

• 419

严肃的马尔科·马鲁利奇是拉丁语有教诲意义的一批专论的作者,在威尼斯、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等地出版了他的这些作品。他与彼得拉克派的爱情抒情诗始终格格不入。他更欣赏与他相投的但丁的精神,他把但丁的《地狱篇》翻译成拉丁语。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拉丁语长诗《犹谪传》,作者在这部长诗里有时候达到了很高的史诗表现力水平。马鲁利奇把幻想深入到宇宙领域,倾听天宇美妙和谐的声音:

那里,彩云一排,空气飘荡,
天际无涯的天体在旋转,
宇宙欢腾,和谐的声音不可违抗……
一个永恒的广漠空间
张裂开来,它是寥廓的寰宇……
在那里,极地的边缘在扩展
它不停地吞没着自己,不知疲倦,
却始终没有达到尽头;
柔和的光芒四射,
沉寂的反光闪烁……

马鲁利奇塑造了与暴君和强权者进行斗争的英雄形象。他歌颂了犹谪的英雄主义,从深奥的拉丁语转为使用人民语言——克罗地亚语,《圣经》的情节表达了充溢着反抗土耳其斗争的情感。人文主义者们从拉丁语古典作家那里借用了假定性形象使反抗奥斯曼帝国的主题更为鲜明。在达尔马提亚最先表现这一主题的是希日戈里奇(《希贝尼克大地荒芜的哀歌》),而在马鲁利奇创作的克罗地亚诗歌《反对土耳其人的祈祷文》中表现得更为有力。马鲁利奇向教皇呼吁,请求他保护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这一请求竟成了旷野的呼声。在《耶路撒冷的幽怨》一诗中(诗中的耶路撒冷就是达尔马提亚)能够感受到爱国诗人的苦痛和失望。

在马鲁利奇的诗歌中,爱国主义、道德激情、以《圣经》中的先知精神抒发的长篇宏论是与生动而鲜明的细节描绘交替出现的。他喜欢描写花园、

宫殿、饮宴、服饰、交战。风格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这位犹谪的歌手对于民间诗歌、诗歌形象和比较都并不陌生。

马鲁利奇在自己的拉丁语诗歌(《犹谪传》及一些寄语诗)中表现得庄严而激昂。他的讽刺短诗则充满辛辣的嘲讽,或者对于同胞的幸福有着深沉而崇高的思考,例如诗中向斯普利特的贵族们提出:

是时候了,你们应该聚集一堂
对于重大事情评断,
维护真理、秩序、法规和正义。
让爱与憎不要搅扰你们的理智,
要珍视人民的声音,
倾听他们睿智的忠告。

十六世纪中叶,达尔马提亚的拉丁语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被克罗地亚语以及意大利诗歌排挤。风靡全欧洲的政治冒险家、拉丁语诗人特兰克维尔·安德雷伊斯(特兰克维尔·帕尔特尼·安德罗尼克,1490—1571年)出生在特罗吉尔,并在那里去世,但是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在拉古萨、帕多瓦和罗马学习,在莱比锡讲解拉丁语经文,1518年在那里出版了《赞演说术》一书和拉丁语长诗《反对土耳其人的祈祷文》(马鲁利奇的影响在诗中极为明显)。同年,在奥格斯堡的会议上向马克西米利安和日耳曼的王公们发表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内容的演说。

达尔马提亚年轻的饱学之士特兰克维尔持信和他写的诗去拜见伊拉斯谟,希望得到举荐,在卢万获得教授职务。在大学任职的想法失败以后,他又去巴黎,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生涯(1526):起初他在法国人那里任职,后来担任匈牙利摄政亚诺什·扎波亚伊的外交代表。特兰克维尔从威尼斯到伦敦,走遍了欧洲国家的首都,成为冒险家阿尔维佐·格利蒂(1480—1534)的秘书。阿尔维佐·格利蒂是摄政的私生子和苏丹的代理人,格利蒂与扎波亚伊为敌并被后者的追随者杀害。特兰克维尔从扎波亚伊统治区逃出之后,为格利蒂写了辩护词。

这位达尔马提亚人文主义者接受他的朋友、已经离开扎波亚伊转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劳的“波兰的尤利塞克斯”——哲罗姆·拉斯基的提议,改弦更张,担任了斐迪南一世的外交代表。作为奥地利的代表他在克拉科夫使人们回忆起波兰的光荣,号召为反对土耳其,解放巴尔干人民而战(《波兰大领主的训诫》,为纪念安德烈·戈尔卡而作,1645年出版)。

3. 民族语言的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十五世纪末在斯普利特和拉古萨出现了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诗歌。在马鲁利奇、门契蒂奇和德尔日奇之前,在达尔马提亚曾经有过一些诗人。马鲁利奇在老一代诗人当中提到了在写作停顿处押韵的十二音节诗的“始祖”。这种诗产生于达尔马提亚中部,运用古代恰卡夫卡方言写成;这种方言至今还保留着古代特征,重音体系比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要自由得多。在达尔马提亚南部(拉古萨)和科托尔湾一带的居民(种族来源为塞尔维亚人)讲什托卡夫卡和恰卡夫卡方言。这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异从来没有妨碍“什托卡夫卡”人和“恰卡夫卡”人的语言交际。在拉古萨的标准语中(其基础是什托卡夫卡方言),不乏恰卡夫卡方言形式。达尔马提亚中部文学诗歌的作诗法和达尔马提亚南部采用同一种体系。

民间抒情诗对达尔马提亚第一批诗人——德尔日奇、马鲁利奇和门契蒂奇已经产生了影响。拉丁和意大利的韵律体系与民诗韵律体系相结合;同样,宫廷骑士文学的情节也与斯拉夫诗歌的隐喻、形象相结合。拉尼伊纳、博巴尔耶维奇、兹拉塔里奇采用了某些意大利的形式(西斯廷诗体,即无韵诗),不过,意大利流行甚广的十四行诗,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诗歌中却几乎见不到。博巴尔耶维奇和拉尼伊纳创作了十四行诗,技巧高超,但却是按照意大利方式写成的。

十五世纪末彼得拉克派诗歌被庸俗化了,形象、隐喻、情节变得重复雷同。诗歌中出现矫揉造作的风格,崇高情感(不是亲自感受到的,而是从彼得拉克的诗歌里生搬硬套)与从罗马哀歌诗人那里汲取的肉欲杂陈一处。当时塞拉费诺·切米内利·德尔·阿克维拉(1466—1500)享有很高声誉。他写了十四行诗和“斯特拉勃蒂”(起源于西西里的短诗,通常是韵脚交替更换的



AMOROSE, E PASTORALI,
ET SATIRE,

Del Mag.

SAVINO DE BOBALI
SORDO,

Gentil'huomo Raguseo.

CON PRIVILEGIO.



IN VENETIA. MDLXXCIX.

Presso Aldo.

博巴尔耶维奇诗集的扉页
1589年 威尼斯出版

八行诗)。“斯特拉勃蒂”和“里斯贝蒂”在乐器伴奏下可以咏唱。这种体裁在意大利宫廷流行之后,经过学识渊博的诗人修改加工,变成了适合于贵族上层社会口味的假民间体裁。彼得拉克式的主题以简化了的形式渗透到“斯特拉勃蒂”之中,将之完全变成了流行文学,实质上和民间创作已经相当格格不入,同时也与歌手拉乌拉的诗歌相距甚远。

拉古萨诗人门契蒂奇、德尔日奇以及赫伐尔岛诗人(尤其是加尼巴尔·卢塞奇)的作品中不仅受到彼得拉克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塞拉费诺·德尔·阿克维拉及其他“斯特拉勃蒂”诗人的影响。在门契蒂奇的作品中不乏塞拉费诺短诗的翻译和重复。塞拉费诺强烈地影响着拉尼伊纳早期诗歌。

希什科(西吉斯蒙德)·门契蒂奇,1457年生于拉古萨的贵族家庭,该家族起源于此城罗马文化的奠基人。他在家乡的人文主义学校受到教育。门契蒂奇具有放荡不羁的性格,不止一次受到拉古萨法庭审讯。成年之后他在共和国担任要职,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选为神学院院长(公爵)。如同大多数显贵一样,门契蒂奇也从事贸易并经常到土耳其去处理事务。1527年他死于鼠疫。门契蒂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创作的范围不够宽阔。他是擅写爱情诗的诗人,有时具有彼得拉克诗作的崇高激情,但更多地则表现为露骨的情欲。这位身兼行政长官和商人的拉古萨诗人的灵感并非翱翔在空气稀薄的天空中。这位拉古萨文艺复兴时代元老辈的诗人认为必须创造新的诗歌词汇,重新理解神话术语的含义,赋予西方宫廷骑士文学和希腊—拉丁文学形象以斯拉夫性质。例如把自然女神、护树女神和山岳诸女神一律都称作“微拉”(微拉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民间传说中的仙女、女巫;把心爱的女人、恋人也称作微拉)。

乔雷·德尔日奇(1461—1501)比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达尔马提亚的其他诗人在更大的程度上采用了民歌。他受过高深的教育,掌握了彼得拉克派的诗学,但他不是模仿者。德尔日奇经常把宫廷骑士文学的情节与民间创作的情节结合起来,有时他的诗犹如民间口头创作情节的变体,他比宫廷诗人洛伦佐·美第奇的作品(例如《鹰与仙女》一诗)更接近于民间抒情诗。达尔马提亚文艺复兴诗歌的特征是人文主义风格与淳朴感情结合,拉丁语诗歌的形象与民间韵律结合。

比斯普利特和拉古萨稍晚一些时候,用民间语言创作的诗歌出现在赫伐尔岛上。赫伐尔岛的贵族加尼巴尔·卢塞奇(1482—1553)创作了爱情诗,翻译了彼得拉克的诗。他还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创作的第一部独树一帜的世俗诗剧《女奴》的作者。剧本用当代题材写成:表现了一个被土耳其人俘虏的斯拉夫姑娘的命运,后来她被自己的情人英雄捷连钦解救。捷连钦是英雄史诗中歌颂的克罗地亚民族英雄的后代。卢塞奇不仅在

《女奴》中,而且在献给朋友们的诗里都强烈地赞美了自由和拉古萨的古朴风格。圣弗拉赫的共和国对于他来说堪称一切美德的典范。民族情感使他倾心于拉古萨:他认为一个斯拉夫国家胜于威尼斯的统治。

赫伐尔岛诗人彼得·赫克托洛维奇(1487—1572)在迟暮之年创作了长诗《捕鱼》,诗人叙述了在达尔马提亚沿岸的岛屿上旅行中结识了两个渔夫的故事。他的描写反映了当代生活。这位赫伐尔岛的贵族对待他的旅伴毫不倨傲,对于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创作很感兴趣。赫克托洛维奇是记录下长音节(“布加什提普”)民间史诗歌曲的第一位南部斯拉夫诗人。他还把三首民间抒情歌曲运用到自己的诗中。在赫伐尔岛诗人中,赫克托洛维奇的朋友米什卡·佩列格里诺维奇(卒于1563年)颇引人注目,他是假面舞会长诗《茨冈女人》的作者,该诗(1599)在拉古萨享有好评。

十六世纪中叶扎达尔的彼得·佐拉尼奇(1506—约1569年)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创作了田园小说《山》,他效仿桑纳扎罗的《阿卡迪亚》把散文与诗歌杂糅在一起。在达尔马提亚文学中用民族语言创作散文是罕见的现象。佐拉尼奇体现人民精神的诗歌更为成功,值得赞扬的是诗人对祖国无限热爱。马鲁利奇对他具有很大影响。

继门契蒂奇和德尔日奇之后,在拉古萨最著名的诗人是马弗洛·维特拉诺维奇(1482—1576)。维特拉诺维奇这个本笃会修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他的讽喻—醒世性长诗《朝圣者》并不很成功,但是他的讽刺作品非常出色,这些作品是针对那些不急于解救被土耳其人奴役的巴尔干人民的尘世统治者,针对拉古萨的宿敌威尼斯,针对僧侣的道德。马弗洛缅怀为了上天国居住而不幸死去、血染沙场、抛弃拉古萨天堂般住所的人们,这时候他喜欢洒上几掬泪水。他的悲剧性长诗《俄耳甫斯》里整个的大自然——群山、森林、河流、碧绿草场上的仙女、蔚蓝色海浪上的女神——一切一切都为欧里狄克而哀悼。《俄耳甫斯》和波利齐亚诺的《俄耳甫斯的故事》取自同一题材。实际上,两部作品之间除了基本情节以外极少有共同点。在维特拉诺维奇的长诗中(尤其关于地狱的描写)更多地感觉到有但丁的影响。他也叙述了自己在孤岛上生活的痛苦、厄运和贫困,丝毫不回避具体生活细节(长诗《隐修者》)。有时候,年迈的马弗洛沉浸在文艺复兴的庆祝活动、隆重宴会和游园的欢乐情绪之中,于是他即兴创作出使人发笑的狂欢歌曲(例如《日耳曼雇佣兵》),歌曲的主题多为听众所喜闻乐见。

4. 马林·德尔日奇

拉古萨的天才诗人马林·德尔日奇(约1508—1567年)与他的伯父诗